

宋太宗赵光义的儿子为何一死一疯



976年,50岁的宋太祖赵匡胤死去,21日赵匡胤的三弟、晋王赵光义即位,是为宋太宗。

在皇位巩固后,宋太宗并不愿意传位于四弟赵廷美,侄子赵德昭、赵德芳。最终,赵德昭被逼自杀,赵德芳夭亡,984年赵廷美以“谋反罪”被贬,死于流放地房州,至此,皇位传承的潜在因素都被清除。但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,宋太宗两个能继承皇位的儿子却一个疯疯癫癫,一个离奇死亡。

根据《宋史》记载,宋太宗一共有9个儿子,长子赵元佐字惟吉,自幼聪明,而且“貌类太宗”,因此深得宋太宗的喜爱。宋太宗还没有立太子,但却让赵元佐在东宫居住。但赵廷美以“谋反罪”被贬时,即将成为皇位继承人的赵元佐却疯了。

原来赵元佐一直与四叔赵廷美关系友善。赵廷美被贬时,满朝文武无一人敢言,“元佐独

申救之”,赵廷美死后,“元佐遂发狂,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”。

宋代文学家苏辙曾记载,赵元佐只是希望皇位重回太祖一脉,于是赵光义便以疯癫的名义将他废黜。于是次子赵元偁脱颖而出。赵元偁极有心计,善用阴谋,颇有宋太宗的风格。

985年重阳节,宋太宗召集皇子们举行内宴,因赵元佐大病初愈没有叫他。晚上宴会结束后,赵元偁带领着众兄弟途经赵元佐的府邸,故意让赵元佐知道内宴的事情。于是赵元佐愤愤的说道:“若等待上宴,我独不与,是弃我也!”再度发疯,喝了许多酒,竟然“夜纵火焚宫”。宋太宗非常震怒,下诏“遣御史捕元佐,诣中书劾问,废为庶人,均州安置”,经过百官的再次求情,才将其软禁在京师。经过此事后,赵元佐彻底远离了皇位,而赵元偁则成为“准皇储”。

992年的一天赵元偁可刚坐在早朝的候见室就觉得身体特别难受,于是马上回府。宋太宗得知后,亲自前往探视,此时赵元偁已经病重,不一会就死了。赵光义悲痛欲绝,下诏废朝五日,并追赠赵元偁为皇太子,谥恭孝。

但冷静下来的赵光义感觉事情不对劲,赵元偁死的实在蹊跷。不久后赵光义下诏,取消赵元偁太子的封号,丧礼降为一品官的等级,并派宦官王继恩彻查赵元偁死因。不久后真相大白,原来赵元偁一直宠爱侍妾张氏,而张氏肆意妄为,意图害死正妻李氏,不料弄巧成拙,却将赵元偁毒死。赵元偁还不是皇帝,甚至还还不是太子,他的女人就争起皇后之位了。

此后的赵光义身心俱疲,他只能将皇位传给略显平庸的第三子赵元侃(长子赵元佐的同母弟),是为宋真宗。 据趣历史

段芝贵和他的移动“总司令处”

段芝贵(1869-1925),安徽合肥人,历任陆军第三镇统制、督练处总参议。武昌起义后,他被袁世凯委任第一军军长等职。袁称帝后,段芝贵立即拥护帝制,被袁世凯封为一等公。

袁世凯死后,段芝贵投靠宗侄段祺瑞,并自称“小段”,称段祺瑞为“老段”。1917年,“小段”随段祺瑞讨伐张勋,被封为京畿警备司令、陆军总司令。1919年改任京畿卫戍司令。1920年7月14日,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,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、曹錕为首的直系军阀之间,爆发了直皖战争。段祺瑞拟兵分两路应敌,段芝贵被任命为定国军东路司令。段芝贵为显示其大将风度,安居家中不出,直到“段祺瑞四次催促”才出发。

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,出征时在车厢上悬一木牌,上书“总司令处”四个大字,而同行的侍从多达百余人。车厢里除了军用品外,段芝贵还叫人装上“烟枪、烟盘十四副,嘴嘴水数百打,麻雀牌七副,大菜司务二十四人”。在火车上,他一面吞云吐雾,一面品评烟土质量。段芝贵好打麻将,当随员们向他报告战况时,他一边打麻将,一边听战报。当听到前方皖系部队受挫的消息后,他还镇定地告诫部下说:“我誓与定国军同生死,诸位怕死,竟请返京可耳。”

当他听说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攻过琉璃河并向长辛店扑来时,才慌了手脚。一天半夜,一部分直系部队前来诈降,乘机袭击段芝贵的总司令部,段芝贵惊得从车上“堕地晕去”,被车站站长隐藏在农家柴堆里,至天明才敢露头,还对部下说:“此何足怪,君子可欺以其方,无伤也。”

此时,皖系已经逐渐不敌直系部队的凌厉攻势,皖系15师已经准备投降哗变,其余皖系军队见状,立即向15师开炮,15师也开炮还击。皖系部队向后撤退,退到琉璃河时,却见总司令段芝贵的专车已经挂上了向后转的车头,于是更加气愤,架起重机枪,朝着车厢扫射。段芝贵立即命令火车发动,轧死铁轨上的几十名士兵,匆匆逃回北京。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“火烧东京”成日本人永久的噩梦

1943年,美国在大反攻时制定了轰炸日本的计划,1945年1月底,美军第21轰炸机集团指挥官柯蒂斯·李梅分管了对日战略轰炸。

3月9日,李梅下令开始执行“火烧东京”计划。鉴于日本战斗机缺乏夜战设备拦截困难,他在晚间出动了325架B-29重型轰炸机。为了增加载弹量,李梅让轰炸机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,全部携带燃烧弹,载弹量从3吨增加到7吨,以小编队多方向进入东京,靠雷达指引轰炸。B-29轰炸机群没有受到拦截就顺利飞到东京上空。

据老一代东京市民回忆,空袭警报响起后,市民认为敌机在黑暗中投弹炸不中目标,大多数留在家中,同时感到即便落下少量燃烧弹靠居民区备用的水桶、沙袋也能扑灭。他们没有想到,这天夜间在东京上空有多达50万枚重7公斤的小燃烧弹,如雨点般地投掷下来。这种“火攻”的方式对具备完善的消防措施且有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官府大楼,以及大工

厂的效果有限,而对居民区有极大的破坏性,百姓大为遭殃。日本老百姓靠水桶和手里的扑火工具根本无法灭火,只好扶老携幼地奔逃,跑不动的人和被烟呛昏的人则在路上纷纷倒下。

美机投下的燃烧弹,是刚制成的凝固汽油弹,难以用水扑灭。3月9日夜投下2000吨燃烧弹时,东京恰好刮起强劲的西北风,一些街区瞬间呈现“火爆”场面,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。

3月10日天亮时,东京26万幢房屋付之一炬。随后市内发现8.3万具尸体,若再算上失踪人员和葬身于废墟之下的人,估计当夜有10万人被烧死,还有10万人被烧伤,这是世界战争史上因轰炸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一次。这也成为日本人永久的噩梦。

由于遭受可怕的火攻,日本各大城市有850万居民逃到乡下,导致许多工厂无人上班,大量小作坊也被烧掉,这都造成生产链中断,基本达到了破坏日本军工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战略目标。

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唐朝昆仑奴来自哪里

清朝以前,唐朝宋朝等都是开放的朝代,与国外的贸易往来繁多,尤其是唐朝,由于军事力量强大,经济也空前繁荣,当时的长安已经是一所国际化大都市,当时长安城内有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,也有各国的使馆。

而来唐长安的外国人中,也有一群特殊的人群,那就是昆仑奴,昆仑奴是奴隶或者下人。昆仑奴个个体壮如牛,性情温良,踏实耿直,贵族豪门都抢着要。

昆仑奴都是来自哪里?为什么叫昆仑奴呢?

在《旧唐书·南蛮传》记载:“在林邑以南,皆卷发黑身,通号‘昆仑’。”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得出,这些人不是来自西边的昆仑山,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来自南边热带地区的,黑身倒并不是说是黑人,而是相对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黑的,这些人大多来自于南洋诸岛和非洲地区,被贩运到唐

朝的,至中土后,或精习乐舞,供人娱乐,或为奴仆,供主人役使,所以时人称其为昆仑奴。

据现代考古和史料考证,中国历史上的“昆仑奴”主要来源是来自西贡(现在叫昆仑岛)上的亚洲马来黑人。而据印度历史记载,西贡自公元三世纪以来就是亚洲最大的奴隶市场,主要向中国销售奴隶,这种贩奴行为一直持续到明代。而古人发音不准确,误将“西贡”读为“昆仑”,这才有了“昆仑奴”的名称。

而我国现在出土的文物中,也有很多昆仑奴俑,他们形象大都是上身赤裸斜披帛带,横幅绕腰或穿着短裤。而当时的唐朝人,都以拥有昆仑奴为时尚,所以昆仑奴在长安很有市场,这就给了贩卖奴隶的商人动力。才成为唐长安城一个特殊的现象。

据历史百家争鸣

明清状元为何没有人当驸马

在谈到明清科举制度中,状元是个绕不开的话题,曾有读者问:“历史上有几个状元当过驸马?”后来调查发现:状元当驸马都是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情节,在现实中这事还真不靠谱。

在已知的记录中,唐代确实有一位状元当过驸马,两宋、明、清时期,未曾发现有一个状元当过驸马的,当然了,这个“驸马”指的肯定是迎娶皇室公主了,并非一般宦人家

的女儿。清代是满族人入主中原,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,历代皇帝都恪守“满汉不通婚”的制度,而清代114位状元中,有111个是汉人,所以从制度上来讲就杜绝了这种事情的发生。

明代是汉人的天下,没有政治制度的限制,那么为何也没有状元驸马呢?

第一,明代共有89名状元,他们中魁的平均年龄为34.58岁,大部分状元是30岁以上才考上的,早已娶妻生子。即使有未婚的状元正碰上未嫁待招的公主,皇帝又岂肯将十几岁的公主嫁给几乎可作父辈的状元。

第二,明清两代的状元家

境一般都不错,而且打小便有过人之处,有的甚至名扬天下。

比如周延儒,尚在孩童时期就被一家姓吴的人家看中了,还接到家里去读书,就算是相对较穷的状元,他们显现出来的过人才学也总会被有些有眼光的大户相中。

明代是理学盛行的时代,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清规戒律甚多,别说是结了婚不容易离婚,就是订了婚,要想解除婚约也是难办的事。谁要是违背前盟,另攀高枝,都会受到极为严厉的舆论谴责。状元们好不容易夺得一顶桂冠,哪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作当驸马的梦。

第三,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夺取天下,必须要笼络一批良将为他卖命,他的女儿,全都下嫁给立有战功的勋臣子弟。后来,他的子孙们也效仿办理,驸马多半是在公侯子弟中物色,因为他们握有重兵,再搞成亲戚关系,更有利于江山的稳固。

由此可见,明代的驸马中,不仅没有一个是状元,而且连一个普通进士都没有,所以,人们常说的中状元当驸马,其实是不合实情的。

据趣历史

民国时期怎样考驾照

上世纪30年代,中国经济发展较快,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,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。对穷人的孩子来讲,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;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,他们家中不缺钱,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驾照的兴趣更为浓厚。在这种“大好形势”下,驾校应运而生。

1934年,《齐塘月刊》提到了广州西关的“南洋驾校”,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,培训期为半年,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。一旦

拿到驾照,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,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(折合50块大洋)。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,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,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,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。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,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。

那时候,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,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。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,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“圣约翰汽

车驾驶学校”。圣约翰驾校在1934年开办,1937年停办,三四年时间培训了630名学员,其中490名顺利考到了驾照。

1947年,上海房地产大亨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创办“女子驾驶人学校”。1936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“沪杭公路汽车竞赛”,傅文浩报名参加,她驾驶一辆跑车,用两小时五十分跑完全程,第一个抵达终点,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,成了一大新闻。抗战胜利后,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。她的驾校有一特色:既重视驾驶技艺,又重视机械原理,让女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术,万一路上出了毛病,自己下车打开引擎盖,摸起钳子就能搞定。 据《羊城晚报》